

黑夜裏不死的激情

• 薛 毅

在兩年前的一次《上海文學》會議上，我曾談及評論家蔡翔80年代以來的著作似乎構成了一種心靈歷史的完整敘述，這在書名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來，它們依次是：《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》、《躁動與喧嘩》、《此情誰訴》、《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》。它們似乎在講述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故事。在清朗的理性的力量背後，蔡翔的著作總透着一種依戀、悲愴與傷感之情。蔡翔最近一部散文集的書名——《神聖回憶》又完全接上了這個故事，在這裏，理想構成了某種已然遙遠的，需要一次次重新反思又需要一次次反覆回憶的、牽扯着的、割捨不掉的精神遺產。

無路可走的理想主義者

蔡翔在《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》裏面描述過一個漫遊者的形象：

我們在走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走的多遠，只知道走，拖着疲憊的身子，形

單影隻，咬緊牙關，跌跌撞撞摸索着走，我們眼中充滿焦慮，不安，飢渴……。

蔡翔在寫這段文字時，內心當然充滿悲涼，但那時，漫遊者前面有着一片開闊地。在《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》中，蔡翔開始迷惑地發問：「我們走向哪裏？」而寫《神聖回憶》的蔡翔卻在喃喃低語：「我不知道我該走向哪裏」，甚至「我已經無路可走……」。

在時間的長河中，一批被稱為知青的人們在不同的地域間穿行、遊走，至今無法止步。如果展開漫遊者的記憶中的時間與空間的兩個維度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張活生生的中國地圖，它指示着從過去到現在的巨大變遷，它標識着從南到北、從東到西的不同色彩。我非常重視漫遊者一代所講述的故事、所創建的理論，因為他們的故事和理論必須面對這種變遷與差異，必須有綜合南方與北方、東部與西部、城市與鄉村的視野，有貫穿今天與昨天、與昨天的昨天的目光。這是漫遊者得天獨厚的。但是，

正是漫遊者，在今天，似乎難以講述完整的故事，無法創建完整的理論。我們熟悉的幾位小說家還在寫小說，但故事越來越破碎；理論家也有理論，但失去了往日的激昂慷慨。他們都更願意用散文的方式來表達自己。

所有的困惑集中在如何面對全新的90年代。在《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》中，蔡翔發現悲壯的漫遊者一跤跌入到一個陌生的、異己的時代：

一個粗鄙化的時代業已來臨。對市場的浪漫憧憬已經終結。市場經濟的體制確立，一方面導致了經濟的繁榮，而另一方面又鼓勵了平庸的價值取向。……自由、平等、公正等等曾經被知識份子賦予精神激情的口號，現在被填注進「私利」的涵義，並作出種種世俗性的闡釋，……對私利的追逐復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義，各個人因為利益而重新紐接在一起，並無情地拆除着政治、道德、倫理、情感等等的傳統關係。社會成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，「戰場」的概念深入人心。私利造成了私人與公共間的矛盾和分離，為了保護這種在當下仍顯脆弱的私人性，一種粗鄙化的保護方式正在盛行，有關「公共」的各種道德規範被無情拆解，道德淪喪，今天的市場成為一個沒有規則的遊戲場所。

這「不是我夢中的陸地」，蔡翔痛苦地喊道：「我曾經夢想的自由，是所有人的自由；我曾經夢想的幸福，是所有人的幸福；我曾經夢想過的尊嚴，是所有人的尊嚴。」但他又不得不承認，「今天粗鄙化的社會實踐，正來自於知識份子昨天浪漫的烏托邦努力」。蔡翔如此描述尷尬、窘迫的「今天的知識份子」：

他們帶着昨天的(簡單的)希望走進今天，然後發現今天並不盡如人意，有點兒不適應，有點兒不滿意，也有點兒不同意(我們的希望難道就是這樣?)。然而此時，他們的精神支撐(道)已經消解(甚麼是我們批評天下的最高憑藉)，啟示的對象消失了(向誰啟示?又有誰來啟示我)，批評的對象消失了(批評誰，批評甚麼)，挑戰的對象消失了(向誰挑戰?為甚麼要挑戰)，他進入了一個「無物之陣」。

在一個需要批判的時代，知識份子卻喪失了批判的能力，因為支撐他們的批判的依據無力應付90年代的狀況。另一方面，誰也都明白，我們的社會的基本認同不復存在，而知識份子的精神信念也仍然是一種「真空」狀態。這時，知識份子重新找回他們的精神支撐是迫在眉睫的(當然，也有許多人以為不然)。蔡翔擱下評論家的筆而進入散文寫作，就是要重新清理一下他自己的精神資源，以不同於80年代的方式理解他們一代「漫遊者」的心路歷程。但是，《神聖回憶》似乎沒有解決他的困境，在很大程度上卻強化了他的無路可走的感受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「神聖」的位置

觸發蔡翔進入回憶的，是圖書館發黃的資料堆中的一段文字，它講述廣州的紅衛兵如何批鬥一個藏有紅色三角褲的女工。蔡翔迅即回憶起13歲的他與一群少年如何衝向被揭發為逃亡地主的小皮匠的家，向逃亡地主舉起拳頭。而在那一瞬間，他看見了那家一個瘦弱小女孩的一雙恐懼的、驚

惶的、羞辱的、無助的眼睛。蔡翔想像，那個女工被批鬥的時候，「她的臉肯定變得蒼白，那雙美麗的眼睛恐懼地、驚惶地、羞辱地、無助地望着人群，或者，她根本就沒望，只是望着那茫茫的天空」。在二十年前的小說《晚霞消失的時候》裏，我們曾遇見過類似的情景，它永遠是咬嚙一代人靈魂的惡夢。當你在為偉大的、神聖的事業而戰的時候，你無法經受那雙驚恐而無助的眼睛的詢問，而所謂的「神聖」卻又轉化為可惡的暴力，傾瀉在無辜者的頭上。

蔡翔原本是要清理自己的精神資源，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之根，但這個情景卻首先挑戰似地直立在蔡翔面前。蔡翔一遍又一遍地敘述着，他追索到的卻總是一連串荒唐的事件，這些都向他提醒着「神聖」的危險性。「神聖」所到之處，所有的異質性都被清除，思想、藝術、生活方式、乃至人的欲望和身體。這種歷歷在目的事實，似乎足以使人拒絕和拋棄神聖。然而，蔡翔卻又爭辯着：

神聖是甚麼？神聖不是甚麼，神聖就是這個詞本身。我對神聖的崇敬，完全是一種對詞的崇敬。是的，這個詞，這個詞是我的家園，是我精神的棲居地，僅僅是我的，個人的，如此而已。在我身居異鄉四處飄蕩的歲月裏，在我被思想的轉至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，在我疏離朋友孤獨地被灰色生活所包裹的日子裏，我默默地守護着這個詞，感受這個詞給我的詩意和美麗，我重新展開我的想像，我滿懷感激之情，默默地守護着。

這種爭辯在理論上有點無力。當你在一連串荒唐的行為都指認為是「神聖」之舉，你如何從中搶出一個潔淨的「神聖」？但一種巨大的情感本能使他必須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。我記得有一次私下交流時，蔡翔突然站起來，嚴肅而紅着臉，對一位朋友說：「我不和你討論這個詞，不需要討論，這是我生命的根本。」從此，我對蔡翔充滿敬意。我覺得這是目睹了過去與今天、在新舊歷史的擠壓中出現的姿



態，是作為失敗的知識份子發出的被壓抑的聲音。這裏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問題是，「神聖」如何才是沒有危險性的？蔡翔靠彼岸和此岸的界定區分了「神聖」與「神聖之物」：前者是想像的、審美的、宗教的，是精神超越物的限制而飛躍的場所；後者則是「神聖」此岸化的結果，是物化的神聖，它用人間的某種事物取代了人們對彼岸的想像，成為唯一者，成為一切者，高居所有人之上。如此，為神聖而戰的人們其實是在為神聖之物而戰。蔡翔以這種方式為神聖留下了一塊淨地，並解釋了歷史。我不信服他的結論，我更願意把這作為知識份子悲壯的突圍行為。對精神的追索已經處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歷史的夾縫中、夾擊下，在突圍中必須時時警惕被歷史所捕獲和利用，我們已經見到不少的話語方式，反思過去的歷史所得出的結論，有意無意為現在作辯護，如蔡翔所說的，「理想殺人」這個命題「正在被那些聰明人利用，為他們平庸謀取個人的私利製造了一個深刻的堂皇藉口」；而批判現實卻美化紅衛兵歷史的方式，也是蔡翔所無法接受的。所以，他如此固執而又如此小心翼翼地為「神聖」確立了一個彼岸的合法位置。

我所不滿的是，為了與導致歷史災難的精神力量嚴格地劃清界限，蔡翔在確立「神聖」的合法地位的同時，把它完全封鎖在想像的、審美的範圍內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蔡翔認為，若非這樣，「神聖」就會有侵略性，就會破壞他人的自由，蔡翔擔心所有的惡夢就會重演，就又無法面對那雙美麗、驚惶的眼睛。所以，必須如此，只能如此。但是，蔡翔對這個結論仍然心存疑慮：

但是，如果陸地終在夢中，如果神聖之火只能在彼岸閃耀，如果這個世界中注定無法變更，維持着窮人和富人的界別，維持着卑瑣和對金錢的追逐，維持着效率帶來的富裕和不義，那麼，我的批評意義何在？

困境並沒有擺脫，路標並未出現。蔡翔心有不甘呀：「無數的悖論一一越過我的情感和理智，我始終在我的情感和理智中矛盾地生活，憂鬱的命運由此開始，我不知道，夜航船，你會把我載向哪裏……」

底層與民間

蘇州河由西向東，蜿蜒蜒蜒地流過這個城市……。河的南面，有各種美麗的建築，有幽雅的法國梧桐和幽靜的宅院，在咖啡館裏，想像這個城市，一個「上海夢」會隨着美妙的音樂飄來。蔡翔卻在講述蘇州河以北的故事，一個混雜着惡臭的、擁擠的、塵埃落地的環境下的故事，一個底層人的故事。蔡翔讓人們看到貧窮條件下的活生生的底層人的純樸與厚道。蔡翔更發現，「幾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終都將落實到底層，底層將這個世界默默托起，同時遵守這個世界對它發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」。作為底層人的兒子，蔡翔具備另一種與來自上層的學者不同的眼光，他不會把善良的底層人看作專制社會的忠實臣民，那個時代改變他們生活的「革命的承諾」，以及他們對國家表示的一種極大的熱情與忠誠，都不是用「專制」一詞可以打發的。而上層人對底層的欺凌與掠奪和底層紅衛兵對官僚憤怒之間，並非沒有關係。蔡翔更震驚地看到，在一

個新時代，底層的美德逐漸被破壞，親如一家的人際關係不復存在，甚至富人對窮人的欺凌與掠奪也延伸為窮人間的同類相殘。而如今，更讓這個底層的兒子無法平靜的是，這是一個大款們一擲千金而「下崗」工人正在為孩子的教育費用掩面而泣的時代。

《神聖回憶》中最悲愴、最優美、最動人的篇章都是關於底層的。蔡翔說起一個故事：清末時期，淮北流傳一個謠言，說洋鬼子來了，要割中國人的「那話兒」，於是鄉民們自動聚集起來，手握農具等待着這個絕望的時刻的到來，人們慘烈地預感自己的生命之根即將逝去。這故事似乎是鄉村愚昧的象徵，但在蔡翔看來卻是一道神示，因為正是這百年間，一種外在的、組織的力量指向鄉村，把個人與大地的關係切斷。在歷史一次又一次的改造之後，鄉村喪失了精神和原則，對土地的冷漠和厭倦悄然誕生。面對這一片喪失生命之「根」的土地，蔡翔能作甚麼？知識份子能作甚麼？

蔡翔在農民家中，在婦女的針線筐中，驚訝地發現了《馬太福音》、《創世記》。蔡翔遙想半個多世紀前，有牧師飄洋過海，在鄉村的油燈下把主的福音翻譯成通俗簡易的中文；他們在烈日下、在風雨中，走過一個又一個村莊，啃着雜麵饅，用半生不熟的漢語講天堂和地獄，講主的榮耀與生之無助。蔡翔悲哀地說，他從未在農民家中發現過中國現代作家的著作，即使是薄薄的一小冊。無形的牆橫互在知識份子與底層民眾之間，而且「隨着新式學堂和知識格局的變更，民間已永遠失去培養自己的知識份子的可能」。

喪失與民間、底層的精神聯繫，知識份子的生命之「根」也就不復存

在。而重返「神聖」之路，不也必須在此起步的嗎？這說起來容易，然而卻是一條漫長的、極為艱難的路。

蔡翔想像着一種遙遠復遙遠的鄉村精神：在南方的深山，聽楓林唱晚，那餘韻悠悠揚揚，一直飄落到北方青青的高粱地裏。街頭老漢的對弈，晃動着士人江邊低吟的倒影，花開花落，潮起潮退，星移斗轉，世事變化，但是總有一些東西未變。那不變的，就是民間，是北方的鄉村和南方的山林。只要有三畝地、一頭牛，人就有信心守護自己的家園。只要地裏長着麥子，炕頭架着紡車，人就有信心不求於外而內足於心；只要有耕讀傳家的形式，聖人之道就會不絕於世；只要冬夜依然有幽幽的胡琴，八月的瓜棚飄出說書人的段子，人就厭棄玻璃，憧憬和平。

在許多人看來，這種想像肯定荒誕不經，但它讓我非常感動。我們無法觸摸到鄉間的精神脈絡，因為我們早已與民間割斷了精神聯繫。真正完全「無路可走」的，是我們這些喪失了底層的眼光的人，是把知識份子在家裏坐着談天說地謊稱為「民間」行為的人。而在這方面，蔡翔實際上已經艱難地走在路上了。尋找到一種真正來自於民間的「神聖」精神，讓底層與知識份子同紮根於中國大地的價值信仰相遇，我想，這就是蔡翔在黑夜中燃燒着的不死的激情。這種激情，是能經受住那雙美麗的眼睛的詢問的。

薛毅 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，文學評論家。